

# 《圣经》:作为艺术文本进场的意义

——读梁工《圣经叙事艺术研究》

王志耕

作为神学、政治及历史文本的《圣经》在20世纪逐渐退场,而随着哲学阐释学及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兴盛,作为艺术文本的《圣经》进场,这既是后现代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景观,也是以艺术拯救颓败世界的人类需求的体现。《圣经》已不单纯是一种信仰的表征,它在今天已成为人类重建其文化与艺术叙事的一种重要资源。当面对现代艺术那不知所措、杂乱无章的个人叙事之时,我们知道,在人类彻底疯掉之前,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健康的、强有力的叙事母本,以恢复正常的模仿能力,有尊严地走向未来。于是对《圣经》叙事的研究在西方出现,并在20世纪后期蔚成风气。在这种背景之下,我们看到,来自古老东方的中国学者也开始介入这一“神圣”事业。我国老一辈学者朱维之先生于1980年代初在南开大学开始招收《圣经》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,当时有一位来自河南的年轻人投在他的门下,承担起他的《圣经》文学研究的衣钵,在中国开始了这一领域的筚路蓝缕的工作。20余年如一日,朱先生这位弟子的大名——梁工,早已为学界所熟知,而在朱先生诞辰百年之后,梁工教授更是推出了他多年心血的结晶之作《圣经叙事艺术研究》(商务印书馆,2006年7月;下注页码均出自该书),成为我国系统研究《圣经》叙事的第一人,也开始了他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之路。

所谓叙事,从认识论角度讲,乃是一种价值立场的施为。可以说,人类的文化史就是由不断的价值叙事文本所构成的。由于人类自身的脆弱性,这种价值叙事呈现两种倾向,一种是历史决定论,一种是

存在论。前者相信人类是在沿着一条上升的曲线迈向完善,而后者则对此持怀疑态度,只相信存在即是本质。无疑,《圣经》正是坚守历史决定论的宏大叙事的代表性文本。而要真正认识《圣经》文本的叙事真谛,必须对其进行学理层面的解读与阐释。梁工教授的《圣经叙事艺术研究》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,可谓细致入微。全书洋洋35万字,在充分的文本细读和理论归纳之上,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《圣经》叙事的主导模式。

首先,是“叙事者”的全程存在。在现代艺术的零度叙事出现之后,起着主导价值作用的叙事者的存在变为一种可疑的成分。而在《圣经》文本中,无论或隐或显,叙事者从不缺席。因此,它具有“无所不知或全知的性质”,它“不但了解各种公开的活动,还能看到隐蔽的行为,听到暗室里的对话,熟悉人物的心理状态,将其最深层的思想展示给读者。无所不知关系到无所不在,上帝了解一切,是因为他无论何时都无处不在”(第68页)。当然,这个叙事者的全程存在并不意味着它始终“显现”在读者面前,当它进行“概述”时,它是显性在场,当它进行“显示”时,则是隐性在场。如书中分析的:“《圣经》叙述者用‘概述’和‘显示’两种方法表现对象。进行概述时从远处瞭望事件,在读者面前铺展出一幅宽广的前景图;进行显示时则近距离审视事件,在读者面前描绘出生动具体的场景。在前一种情况下,读者得知什么事已经发生;在后一种情况下,读者用自己的眼睛看到某件事正在发生”(第66-67页)。但即使是你自己看到的,仍是在“预先设定的叙事

框架”之中的事件。而一切在预定之中,正是宏大叙事的基本特征。

其次,是不同功能元及视点的价值统一。《圣经》遵从着艺术叙事的一般规律,在讲述技巧、人物塑造、情节设置等方面讲求丰富性、多样性、生动性,以实现艺术感染力的渗透。但与此同时,艺术感染力渗透的根本目的是价值的渗透,这种价值渗透有赖于以各种艺术手段保持价值立场的统一。例如,《圣经》为达到价值的统一,显然不能认同于“杂语喧哗”式的观看与评价方式,也就是说,个体的目光不能取代上帝的目光,即使上帝的目光暂时消隐。诚如梁工教授所分析的:“在《圣经》中,如果说先知文学和智慧文学以直抒胸臆的方式公示作者的见解,号召读者接受其劝诫,那么叙事文学便诉诸间接、含蓄、不事张扬的态度,借助包括聚焦在内的多种叙述手段,使隐含读者在潜移默化之中心悦诚服地采纳隐含作者的观念”(第73页)。在人物塑造上,梁工教授提出,《圣经》叙事是在二元对立的原则下处理其人物关系及性格配置的,即人物个性是以“二分法”的对照模式设定的,其基本对立则体现为诸如“善良与邪恶、虔诚与悖逆、圣洁与淫靡”(第106页)。其实,这种二元对立并非“间性”对立,而是“对立统一”。有人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带有神学色彩是不无道理的,因为《圣经》的统一逻辑决定了它通过正反两种路径使其唯一价值立场获得确证,而这或许也正是黑格尔哲学的本体论资源之一。二元对立的,或曰对立统一的人物格局,标志着《圣经》对世界整一性和确定性的肯定:善良必受恩赏,邪恶必受惩罚;虔诚必获救赎,悖逆必趋消亡;圣洁必得尊崇,淫靡必遭唾弃。《圣经》的普世价值就在这种对立统一之中实现。

其实,归结起来,《圣经》叙事的总体特征是意

义的完整性。《旧约》与《新约》是否意义统一的标准文本,在释经史上众说不一,而梁工教授从叙事分析的角度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。他认为:“《新约》叙事著作的代表作是四福音书和《使徒行传》,……它们与《旧约》相衔接,由犹太民族的弥赛亚观念连成一体。时至公元4世纪,一部始于上帝创世、止于未来新天新地降临的基督教《圣经》成为犹太-基督教历史画卷的元典,其中所有层面的事件都被这个整体赋予既定的含义”(第147页)。从这一意义上说,《圣经》是典型的隐喻型文本(弗莱语)。所谓隐喻文本,是相对于近代转喻文本和现代通俗文本而言的,其根本特征是喻词与喻本严密对应,或曰混融一体的形态,也就是说,文本能指即是文本所指本身,它的意义并不溢出于文本能指系统之外,总之,它是象征的,而不是反讽的。

反讽的叙事形态,正是当今世界的典型的文化表征,因为,自19世纪尼采宣告上帝死去之后,人类便逐渐失去了自身意义所附丽的母体,意义无法通过文本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传统定义而获得表达。所以,我们放眼望去,这个世界充斥着漂浮的能指碎片,它们借助于私人的、微观的、零度的叙事包围着我们。人类在意义缺失的状态下可以存在多久?这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。于是,在后现代危机日益明显的今天,对意义的呼唤已渐成时代的强音。我们期待于《圣经》叙事艺术研究的,或许不仅是在文学领域如何为历代文学寻找其叙事模本之源,更是对一种人类救赎资源的重新发掘。在这个伟大的拯救事业中,我肯定地说,梁工教授的工作标志着我们开始跨出重要的一步。

(作者王志耕博士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
【责任编辑 郭德民】